

【经济学学术前沿书系】

STUDIES ON BUSINESS CYCLE THEORY
UNDER RATIONAL
INATTENTION HYPOTHESIS

理性疏忽框架下的 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王军 等◎著



在西方经济学学科体系的研究中，对于经济周期理论的认识与研究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重要的学科基础问题。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许多经济学家们都有各自的学说与理论，建立在理性疏忽假设基础上的粘性信息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最新发展。

非外借

【经济学学术前沿书系】

理性疏忽框架下的 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王军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疏忽框架下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 王军等著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6.9

ISBN 978 - 7 - 5196 - 0014 - 3

I. ①理… II. ①王… III. ①经济周期理论 - 理论研究 IV. ①F0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8181 号

理性疏忽框架下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作 者	王 军等
责任编辑	杨 頔
校 对	徐建华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 - 63567683 (编辑部) 010 - 63516959 83559665 (发行部)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	edpbook@126.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小 16 开
印 张	9.5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6 - 0014 - 3
定 价	38.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成果(项目号:11YJA790148)

前 言

在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认识与研究长期以来都是重要的学科基础问题，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纷繁复杂的学说与理论。21 世纪初，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夫·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提出了理性疏忽（Rational Inattention）的假说、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决策者如何对注意力这种稀缺资源进行分配，认为决策者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在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不同的状态变量时，必须对其进行分配。近年来，理性疏忽理论的分析领域不断拓展，在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研究中也表现出强大的分析能力，对主流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能力。

为了追踪当代经济周期理论的前沿进展，我们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理性疏忽框架下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项目号：11YJA790148），对理性疏忽假说下的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与梳理，本书就是作者主持的这一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研究在占有大量前沿文献的基础上，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了西姆斯等经济学家的理性疏忽思想，剖析其基本内涵、分析方法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并系统阐述了理性疏忽下的经济周期理论，最后结合中国实际做出了适用性分析，并对中国具体的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书除绪论外包括七个章节：

前四章为主体理论部分。第一章对当代新凯恩斯主义的理性疏忽与粘性信息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着重从理论发展脉络上对理性疏忽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综述。第二章重点阐述了理性疏忽理论的代表人物，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的基本思想与观

点,评介了其理性疏忽理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认为这一理论将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纳入经济分析之中,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解释经济主体的粘性选择行为,克服了传统完全理性假说的非现实性问题,在微观经济行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周期等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广泛应用。第三章、第四章阐述了具有信息处理约束的经济周期与增长模型,并从建模思想方法的角度研究理性疏忽理论对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以理性疏忽假说在RBC模型中的应用为切入点,对经典理性疏忽经济周期模型进行了评析,剖析了这一模型的理论适用性。

后三章为实证研究部分。第五章的主题是理性疏忽与粘性信息背景下的最优货币政策研究,还验证了粘性信息模型对中国状况的解释能力,得出了粘性信息模型和中国数据拟合良好,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第六章着重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差异,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特征进行了研究,探讨劳动与资本对这三个区域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近年来三个地区经济周期性波动有趋同的趋势。此外资本变化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东部地区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人力资本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基本一致,但高于西部地区。第七章分析了制度变迁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了由制度、劳动、资本三种因素共同决定的技术内生化的宏观生产函数。计算出该生产函数下的经济增长率,发现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制度修正系数、人口增长率以及制度与劳动在宏观生产函数中的贡献率。要实现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改革的动力,实行规则化的制度变迁。

本书是项目组合作研究的结果,也是对各位成员付出的艰辛与努力的一次总结。各章的作者分别为:绪论、第一章,王军、沈少博;第二章,王军;第三章,李振萍;第四章,王军、丁玲;第五章,刘蓆;第六章,王军、束笛;第七章,王军、邹广平、石先进。全书由王军负责总纂。

本项目的顺利实施以及本书的最终出版,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的资助,在此深表谢意。此外,还需要特别感谢经济日报出版社胡子清编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徐雪教授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由于理性疏忽假说下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一个仍在不断发展着的前沿理论,由于能力有限,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学者专家指正。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
二、研究文献综述	2
(一) 国内外经济周期理论文献综述	2
(二) 理性疏忽理论文献综述	5
三、本研究的创新与研究方法	7
四、本书的基本框架	8
第一章 新凯恩斯主义理性疏忽与粘性信息思想	9
一、引言	9
二、粘性信息的含义	10
(一) 粘性信息的理论背景	10
(二) 粘性信息的内涵	11
(三) 基本模型：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	11
三、理性疏忽：信息粘性的根源	13
(一) 完全理性假说的非现实性	13
(二) 理性疏忽与最优采样	14
(三) 疏忽模型的细化	15
四、理性疏忽、粘性信息对于经济分析的含义	16
(一) 粘性信息的一般均衡模型 (Sticky Information General Equilibrium)	17
(二) 理性疏忽条件下的经济波动与周期	19
(三) 粘性信息对于经济政策的意义	19

五、经验检验与批评意见	21
(一) 对粘性信息理论的经验验证	21
(二) 对粘性信息理论的批评意见	22
六、简要的评论	23
第二章 克里斯托夫·西姆斯的理性疏忽理论评介	27
一、理性疏忽假说的基本含义	27
(一) 完全理性假说的非现实性	27
(二) 理性疏忽假说的理论内涵	28
二、理性疏忽模型的构建	29
(一) 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	29
(二) 理性疏忽的基本模型	30
三、理性疏忽假说对于经济分析的意义	31
(一) 对粘性行为的统一解释	31
(二) 与实际经验的一致性	32
四、理性疏忽模型的扩展与应用	33
(一) 理性疏忽框架下的消费与劳动行为研究	33
(二) 理性疏忽框架下的经济政策研究	34
(三) 理性疏忽框架下的经济周期研究	34
五、简评	36
第三章 理性疏忽、粘性信息与经济周期	39
一、理性疏忽的含义	39
二、信息处理约束条件	40
三、理性疏忽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	41
四、理性疏忽框架下的经济周期模型	46
(一) 家庭	47
(二) 厂商	47
(三) 均衡	51
五、理性疏忽增长模型与 RBC 理论的比较	52
(一) 基本 RBC 理论模型	52

(二) 理性疏忽随机增长模型推导	55
(三) 对两种模型的简要评价	61
六、理性疏忽经济周期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64
第四章 理性疏忽建模思想及其对 RBC 模型的发展	70
一、引言	70
二、有限信息处理能力的数学表示	71
三、理性疏忽 LQG 框架与两时期模型	72
四、理性疏忽条件下的 RBC 模型及经济解释	74
(一) 单一状态变量的随机增长模型	74
(二) 多状态变量的 RBC 模型	76
(三) 两时期劳动供给模型	77
五、进一步研究方向	79
六、结论	80
第五章 理性疏忽与粘性信息框架下的最优货币政策	83
一、引言	83
(一) 问题的提出	83
(二) 文献综述	83
(三) 本文的研究方法	90
二、粘性信息下的最优货币政策推导	91
(一) 模型框架	91
(二) 粘性信息模型的简要介绍	93
(三) 粘性信息模型下的效用函数	101
(四) 粘性信息框架下最优货币政策分析	103
三、理性疏忽与粘性信息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	104
第六章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周期的差异性研究	111
一、引言	111
二、不同地区 GDP 增长率波动的历史情景与比较分析	112
三、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实证分析	116

(一) 模型修正	116
(二) 模型估计	119
(三) 计量结果比较分析	120
四、结论	121
第七章 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123
一、问题提出	123
二、引入制度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124
(一) 基本假设	124
(二) 技术内生化的物质生产函数	125
三、基于 VAR 模型检验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28
(一) 变量选择与描述	128
(二) 向量自回归 (VAR) 实证方法准备	133
(三) VAR 脉冲响应	135
四、结论及建议	137
(一) 结论	137
(二) 建议	138
(三) 进一步研究方向	141

绪 论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经济波动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过程,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并且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换,中国经济波动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出现了新特征以及新的形成机制。由于经济波动会威胁到经济增长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给社会福利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新环境、新阶段下准确刻画经济波动的特征,研究经济波动的形成原因,以及对政策效果和未来经济波动走向进行模拟和预测具有必要性。

然而,主流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往往都是以完全理性为假设前提。这种完全信息处理能力的假设过于完美,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导致一些经济模型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薄弱。近年来,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理性疏忽”假说,即经济主体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只能将有限的注意力进行最优的分配,不再处理全部信息,而是理性地选择处理部分信息。目前,大量研究已将理性疏忽假说应用于宏观经济模型中,并较好地解释了宏观变量的动态特征所表现出的粘性行为以及经济周期的不对称性。例如,经济主体处理信息能力存在限制,使得其对经济体中各种变化的反应存在滞后性,从而可以解释经济变量动态特征表现出的粘滞性;理性疏忽所隐含的注意力分配问题,则可以解释经济周期的不对称性;并且,这一假说的引入改变了原来模型的冲击扩散机制,从而使不同变量的易变性以及变量间的共动性产生新的变化。可见,理性疏忽假说是对理性人假说的重要修正,使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模型更贴近现实情况。

综上所述,将理性疏忽假说纳入我国经济波动和政策效果的研究中,既是对西方经济理论前沿的追踪探索,又是以新的方法和视角来分析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情况,试图更有效地解释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特征、

探索各变量面对经济政策冲击的反应路径和程度,进一步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机制和实施效果,这对实现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文献综述

(一) 国内外经济周期理论文献综述

西方的经济周期理论虽然产生时间甚早,但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经济周期理论通常以不同学派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或附属内容的形式存在。有关经济周期的理论观点庞杂而缺乏系统性。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在 20 世纪早期,经济周期被视为宏观经济研究的中心问题。经济周期理论旨在研究经济活动周期性扩张和收缩的原因、性质与后果。从经济周期理论流派的演变过程看,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得正统地位,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更注重货币条件以及厂商和心理因素,经济研究集中于如何应用各种政策去影响均衡产量水平。在对经济周期的解释上,货币主义者认为总需求的不稳定是经济周期产生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总需求不稳定是货币供给不稳定造成的,将经济周期波动完全或主要归结为货币数量的变动。现代货币学派代表了对早期的纯货币理论的基本观点的回归,包括源自交易方程式“ $MV = PQ$ ”的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考察。货币学派单纯利用货币因素重新解释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起因,并坚持认为货币供给上的变化,即货币冲击是诱发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大多数可以观测到的经济波动均是由货币政策变化造成的。因此货币学派强调若要使经济稳定运行,将货币供给增长率控制在某个长期固定的水平上是其充分必要条件,这体现了货币学派“唯有货币最重要”“经济波动是‘美元在跳舞’”的理论观点。

货币主义者一个重要的命题是:总需求能在短期内影响产出和就业,但在长期内产出和失业率同总需求无关。他们认为,在长期中,经济社会的总产出由许多实际因素决定,包括技术进步、劳动供给、投资和制度创新等,短期内的总需求变化的确可以影响产出,形成经济波动。弗里德曼(Friedman)和(Schwartz)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

和他们出版的一系列书籍和文章，展现了货币数量、经济行为和价格水平在的逻辑关系。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短期中，由于人们存在货币幻觉，货币当局政策的不稳定导致了总需求的波动，从而引起了经济的不稳定，实际产出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出现偏离。

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结束了持续增长的黄金期，衰退开始蔓延，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无法再对现实给予满意的解释。此时，以卢卡斯和萨金特领导的“理性预期革命”为契机，人们又开始重新重视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在此之后，经济学家意识到实际供给面冲击的重要性，开始尝试用实际因素去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用真实的技术冲击来代替货币等名义冲击，也因此促成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诞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理性预期学派的基础上，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等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简称 RBC），并因此而共同获得了 2004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考察实际经济，强调是由经济活动中以技术变动为代表的随机实际因素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不是货币等名义因素，属于典型的外生冲击理论。该理论认为：最初的经济波动来源是外生的，波动的根源为实际变量，而非名义变量。所谓实际变量的冲击，包括个人偏好的变化、政府需求的变化等来自需求方面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RBC 理论强调供给的主导作用，其核心是资本积累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这被作为理解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RBC 理论认为，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经济力量带来了经济的波动，即供给冲击是产生波动的最主要根源。RBC 理论认为，经济系统频繁受到影响产生的外生冲击，考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行为，人对经济环境中随机冲击因素作出的动态反应，对这些冲击的最优反应导致了消费、投资和产出等与原来稳态值的偏离。

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两人共同开创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创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 DSGE）方法亦成为目前宏观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技术冲击等真实因素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经济波动依赖于扩散机制，资本积累及劳动跨期替代弹性具有重要作用。经济波动是一种帕累托最优调整，它是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在面对技

术冲击时做出的最优反应的结果。所以,经济系统在任何时期都处于均衡状态,试图稳定经济波动而进行的政府干预是无效的。

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没有市场失灵,也没有货币因素,也不需要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考虑到基本模型(K-P模型)的极端假设使其难以解释与劳动市场有关的特征事实,一些学者逐步放宽假设,改善基本模型。汉森(Hansen)(1988)建立了不可分劳动的RBC模型,使人们只能在全职工作和失业之间做出选择,以使工时数的全部变化由就业人数而非人工调整决定。汉森模型模拟的外生技术冲击参数比较小,模型结论与实际的工作时间数据更加接近,但与劳动的平均产出数据匹配性较差。Burnside, Eichenbaum 和 Rebelo (1993)在RBC模型中引入劳动窖藏,假定工人必须事先决定在下一个时期工作多少时间,在本期只能改变工作强度。劳动窖藏模型会导致劳动有效供给的波动,与基本模型相比会降低生产率与劳动的相关性,并能够解释产出的动态特征,使技术冲击高估的问题得以解决。

King et al (1988)和Greenwood et al (1988)引入投入要素的利用率,对劳动跨期替代之外的传播机制进行研究,建立以资本积累为内生传导机制的RBC模型。Greenwood、Hercowitz 和霍夫曼(Huffman)(1988)发现某些冲击不直接影响当期产出,但会影响当期投资的期望收益。资本可变设备利用率的引入可以降低对劳动跨期替代弹性的依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学者引入了新的冲击源,而不再将技术看成经济波动的唯一源泉。Christiano 和 1992 引入政府购买冲击,使产出的波动幅度有所提高,却并没有显著改善内生传导机制。Baxter 和 King (1993)在模型中同时加入了政府购买和扭曲性税收两种财政政策冲击,使得消费和劳动时间的波动性有所改善,模型解释力有了较大提高。还有学者将货币冲击引入RBC模型中,并且只有与价格或工资刚性结合时,货币冲击影响才较大。Smets 和 Wouters (2003)的研究显示货币冲击无法单独引起经济波动,但可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在国外非常丰富,我国学者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正逐步深入。卜永祥和靳炎(2002)用相对简单的RBC模型解释中国经济,通过将技术冲击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冲击引入模型,并计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方差比率,认为技术冲击

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 76%。龚刚 (2003) 认为 RBC 模型以市场出清一般均衡为假设前提, 这将影响模型在实证分析中的有效性。他对 RBC 模型的求解和检验方法做了较全面的介绍。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 (2004) 在基本 RBC 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 对我国 1952—2001 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模拟研究。黄贇琳 (2005) 构建了包含政府部门的 RBC 模型, 分析技术冲击与财政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可以对 70% 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做出解释。但是, 其对与消费相关的变量进行了特殊处理, 使模型合理性下降。陈昆亭、龚六堂 (2006) 构建了包含内生货币和粘滞价格机制的 RBC 模型, 模型对产出的粘滞性和波动性的模拟结果与事实经济情况非常接近, 但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水平的模拟与实际偏差较大。耿强、江飞涛和傅坦 (2011) 在 RBC 模型中加入产能利用率, 在经济波动和产能过剩之间建立联系。该文强调政策性补贴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 其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可以看出, 虽然 RBC 理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外生随机冲击, 已经成功地解释了一些基本的商业周期事实, 但基本 RBC 模型也存在明显不足。在实证分析中, RBC 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和不是很好, 且绝大多数 RBC 模型不能解释产出的动态特征, 进而无法解释大多数主要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周期模式; 此外, RBC 模型的传导机制微弱, 产出的周期主要由外生的技术冲击驱动。因此, 对基本 RBC 进行扩展与改进, 增强对实际经济的解释力, 正是当前学者不断努力的方向。

(二) 理性疏忽理论文献综述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价格和工资具有粘性, 市场无法立即出清, 而是存在缓慢调整的过程。为了解释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粘性”现象, 不完全信息理论应运而生。Mankiw 和 Reis (2002, 2006) 提出的粘性信息理论强调, 并非所有人都依据最新信息而决策, 在时间和资源的制约下, 经济主体交错更新信息。Sims 着重探索粘性信息产生的根源, 开创性地提出理性疏忽假说。Sims (1998, 2003) 阐述了理性的疏忽的内涵, 并以信息论为基础, 将经济主体有限的注意力转化为受约束的信息流, 构建了理性疏忽线性二次高斯 (LQG) 最优控制框架。Sims (2006) 以消费—储蓄决策、

为例,给出了更加一般化的两时期理性疏忽模型。此模型超越了 LQG 框架,信息处理能力约束采取了非线性的模式,最优分布也不局限于预先设定的高斯分布,而是由模型的目标函数决定。此后,理性疏忽理论被众多经济学家所接受,并被纳入各种理论模型,用于探讨有限信息处理能力如何影响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做出最优决策,以及其所蕴含的均衡条件和政策含义。Luo (2008) 和 Tutino (2009) 着重研究固定利率下的消费—储蓄决策。Ma'ckowiak 和 Wiederholt (2009), 以及 Matejka (2010) 则更加关注微观行为,对厂商的定价决策进行了深入分析。Batchuluun, Luo 和 Young (2008) 探讨了效用函数为相对风险规避型 (CRRA) 形式的理性疏忽主体在两时期内的投资组合决策。

理性疏忽理论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应用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 Luo 和 Young (2009) 将 Sims (2003) 提出的理性疏忽假设和拥有永久技术冲击的随机增长模型相结合,以考察这种模型能否弥补标准 RBC 模型的缺陷——不考虑内部传导机制,以及不能解释经济变量的粘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由信息约束造成的内生需求冲击,消费波动性有所提高。但是,将理性疏忽作为唯一内部传导因素不足以解释标准 RBC 模型遗留下的问题。只有当经济主体无法区分异质冲击和总冲击时,理性疏忽才会产生明显的内生传导效应。Martins 和 Sinigaglia (2009) 将 RBC 理论与理性疏忽模型相结合,考虑了不确定性的多种来源,将信息摩擦作为一种内生调整,并采用 Sims 提出的线性二次方程,将理性疏忽转化为传统的信号提取问题。理性疏忽使消费的波动性以及其与产出的同期相关性增加,同时降低了投资和工作时间在上述两方面的表现,这是对基本 RBC 模型的改进。Menkulasiy (2009) 以 Mackowiak 和 Wiederholt (2009) 的模型为基础,解释美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稳健”现象。Batchuluun (2009) 将理性疏忽假说应用于标准的两时期劳动供给模型,考察家庭做出的消费—储蓄、劳动—闲暇决策。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的经济主体无法观察到真实的财富和工资状态,从而无法依据它们做出精准决策。结果,由于不知道当前到底处于何种工资水平,劳动—闲暇决策与工资的相关性减弱,并且财富和工资的未来不确定性也对劳动供给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述文献,都采用了相对简单的方法,将理性疏忽引入以“社会计划者”方式建模的真实经济周期经济模型,并且没有考虑名义变量的波动

性。以后的学者，在 Sims（2003）所阐述的信息结构基础上，进一步将理性疏忽与宏观经济模型相结合的方式扩展，并将理性疏忽延伸到微观个体层面，在新凯恩斯主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下考察名义变量的波动性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Mackowiak 和 Wiederholt（2009）首次建立了理性疏忽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在这个模型中家庭和厂商决策者都拥有有限注意力并决定如何分配，央行按泰勒规则制定名义利率，有限的注意力是经济变量粘性特征的唯一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理性疏忽条件下，名义价格水平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十分缓慢，对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的反应稍快，但对微观层面上的异质性冲击反应速度十分迅速。同时，消费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反应也很缓慢。这说明无论厂商还是家庭对货币政策的关注度都小于其它方面，因为技术或微观异质性冲击的易变性要大于货币政策的易变性。最后，将理性疏忽模型和 Calvo 模型进行了对比，认为理性疏忽可以代替粘性价格和行为惯性，作为经济变量存在粘性特征的原因。Paciello（2011）以 Mackowiak 和 Wiederholt（2009）所提出的模型为基础，认为除了各种冲击的易变性不同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注意力分配外，价格水平的动态特征更主要取决于货币政策，即利率反馈规则会影响经济体的注意力分配。政策对预期到的通胀和产出波动反应越快，越会诱导厂商给予易变性大的变量以更多关注，从而放大了价格水平对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的差异。Dworczak（2011）也将 Mackowiak 和 Wiederholt（2009）的模型进行扩展以研究财政政策，并引入了注意力动态分配的概念。认为在注意力呈动态分配的条件下，当财政冲击很小时，挤出效应也很微弱并且财政乘数接近于“1”；而当政府支出非常大时，挤出效应也会变大，并且乘数显著地小于“1”。

总之，理性疏忽经济周期模型的预测结果比基本 RBC 模型有了显著改进，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值得我国在经济周期的深入研究中借鉴。

三、本研究的创新与研究方法

1. 理性疏忽假说是对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说的一个重大修正，这一理论